

闽东畬族文化的渊源、承传及相关问题探索

林校生

摘要:我们今日说的畬族传统文化,其主体只能是经由明清两代漫长历史过程,有限采借汉族文化,而逐渐发展定型的少数民族文化。文化承传有绪,本无需刻意“保护”,今日“保护”之声鹊起,乃是遭遇工业化、现代化潮流的特有景观。过去行之有效的畬族传统文化承传方式,还有一定作用,但已经越来越弱,应运而生的各种各样行政性的或市场性的或两者混合的“保护对策”,成效各有胜场,也存在种种局限,关键是能否维持畬族文化自然承传演化的底脉。

关键词:畬族文化;承传机理;保护措施;文化生态

一、“畬族传统文化”的界定与基本分析

1. 关于畬族形成史的两种观察向度

关于族群概念的理解和把握,一个多世纪以来颇有“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或者说“客观文化特征派”与“主观认同派”的不同取径。^[1]这当然也适用于畬族群的研究。而换一个角度看,畬族群的形成问题,或亦有“从源辨流”与“由后观前”两种观察方法。

所谓从源辨流,即是建立汉唐甚至更早的南中国的族群分蘖图谱(也有涉及北方的,如潘光旦先生),从中厘定畬族逐渐成形的历史过程。这个方面,许多老一辈的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丰硕成果,恕不一一列举。在他们的基础上,后起一代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有很大推进。例如,畬族是何时、如何形成的?谢重光用畬、客互动的眼光观察问题,用畬族多元一体的格局阐释问题,在细密辨析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畬族族源主要包含百越后裔、南迁武陵蛮和入畬而被畬化了的汉人三大部分;南宋中叶在赣闽粤边已经形成一个有共同的地域、经济、语言和文化心理的新族群。^[2]这个意见很值得关注。当然,作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56个成员之一的畬族,是上个世纪50年代政府组织、学者识别、族群意愿等等多个方面互动乃至博弈的结果。它在相当程度上已非谢重光指认的

那个南宋畬族的自然发展产物。如此,或许还需要有由后观前的回溯,

所谓由后观前,即是从畬族发展的晚近乃至现今之状态而逆向考寻它此前行迹的重要关节点。蓝图、蓝炯熹根据“闽浙赣交界地是我国当代畬族的大本营”(2000年占大陆畬族总人口的51.93%),根据“闽浙交界地正是畬民族成分调查识别的最主要区域”,认为这一带是元明清“畬民完成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枢纽地区,“假定没有闽浙赣交界地人数众多、特征明显的畬民存在,也许闽粤赣交界地的畬民就有可能被归入客家民系或者被划到瑶族之中”。^[3]这个看法,可以得到施联朱先生参加民族识别工作回忆材料和新近整理出版的《福建畬族档案资料选编》的印证,^[4]也与上述谢重光先生的看法相互补充。

综合上述两种观察,特别是后一种“由后观前”的观察,笔者认为,畬族群的核心集居地,经历了从潮州到汀、漳再到福宁府的变化过程,从严格一些的判断标准来看,在“潮州中心期”,畬民的文化特点尚未与东南地区诸多山夷峒蛮清晰地区分开来,尤其未与同有盘瓠崇拜、同有“皇赐券牒”、且有共同姓氏和相似语言的瑶族清晰地区分开来,而当时的文书、方志也往往以瑶、畬联称或以瑶、徭代称。在“汀、漳中心期”,畬民农业经济从游

* 作者简介:林校生,宁德师范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阶段性成果,批准文号:13@ZH001,责任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收稿日期:2015-10-26。

耕趋于定耕,与同在深山老林的客家人共处渐密,相互影响渐多,宗族观念日益强化,他们与瑶族的区分则随着地块上的愈行愈远而逐渐增大起来,这时候常见的则是畬、客混称或联称。到了中晚清的“福宁府中心期”,畬民确立了定耕、定居的生产、生活方式,建宗祠、修族谱,参加科考,在受汉族文化影响越来越深的同时,注意持守自身的特色文化元素,至此,一个与汉族文化相区别的少数民族群——畬族的建构过程才基本完成。^[5]这样的表述,自然也仍有可以商榷之处,但我们今天讲述或者说研究所谓畬族史,确实不能无视极具中国特色的“民族识别”工作的干预和影响。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领导和中央民族大学专家联合主编的《中国的民族识别》一书的副题叫做“56个民族的来历”,^[6]是颇具典范性的作品,它主观上十分强调民族的客观特征和客观发展源流,而客观上却也提供了民族主观建构乃至被建构的不少资料,从一个方面相当生动的表现了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当代史性质”。^[7]

2. 明清以来促成畬族由迁徙而定居的特殊地理、人文要素

整体上来看,畬族群大量进入闽东北,是明中叶以来的事。这里山岭陡峻,山涧湍急,可以垦辟田园的资源十分有限,南宋以来人地关系一直很紧张。相对弱势、落后的畬族人口成规模的迁入相对强势、先进的汉族地区,在闽东沿海地区大量集结,必然有其特殊历史机缘。这个特殊历史机缘,从人文因素考虑,笔者以为主要发端于明嘉靖后半叶二十余年“倭寇”连续大肆侵掠造成的人口剧减、地权档案亡佚、寺院地产易主,继而又接连遭受南明清军之激战,清初“迁海封禁”到复界招徕的巨大反复,等等,畬人遂得自粤东、闽南大量入迁。^[8]从自然环境的因素考虑,畬民聚集最多的福安县正是整个闽东北洪涝之灾最经常、最严重的县份,仅以乾隆本《福宁府志》卷43的记载来看,明代水灾频繁,兹举五例如下:

洪武十九年(1386),大水。人民淹没大半,田园丘墟,福安十数年荒落。

成化五年(1469)七月十四日,福安东平二溪水溢,疾风猛雨从之,大浸稽天,方之洪武十九年,水加五尺余。

正德十三年(1518)六月,雨弥旬,水浸福安县。

万历九年(1581)七月初九夜,大水流福安县,白浪高于敌台,枕尸狼藉,城坏,仅存东、北二隅。

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福安大水,漂溺庐舍、人畜无算。

也就是说,这个县在明代,至少五十到八十年就要发生一次全县性的淹没性的特大水灾,这里地处滨海河谷,当上游大雨,长溪(交溪)迅速汇集诸路山洪,此时若受海潮顶托,顷刻便成没顶大灾。灾后田园毁坏,劳力凋残,外来人口入迁成为本地恢复、发展生产的必要变量。到清代,洪灾依然,如,同上书记载:康熙十四年(1675)八月,福安大水,舟入城;二十八年(1689)八月十七日,福安洪水暴涨,浸没县城东、西、南三处,庐舍漂没,男、妇死者无数;五十九年(1720)七月,福安大水,入城东南隅。明清连绵不绝的洪灾破坏,恐怕是福安成为畬族自然村最多县份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9]

3. 畬族的散杂居化与畬汉关系的转型

我们可以把晚明“倭患”、海寇,南明拒清和清初“迁界”与畬族群迁徙的关联,看成一个连续的过程。闽东北历来山海环抱,远离喧嚣,很少受到兵革动乱的冲击。但如上所述,从明代中叶到清初的百余年间,却接连遭受“倭寇”之洗劫、南明清军之激战、“迁海开界”之反复,沿海遂常有荒残之地,畬人得以离开深山临时搭盖的草寮而入居,渐由“候鸟式”种菁转为定耕,建房兴村。这些畬村,多数海拔不高。闽东北现有230余个畬族建制村,据笔者所查212村,其分布格局是:海拔较高的畬村,集中在山区县,但总数无多;沿海地区畬村多,且海拔不比同区的汉族山村高,也不比它们偏僻。^[10]

这是以建制村为单位而作的描述,深入到它们所辖的众多自然村,情况会更加复杂些。日本学者富田芳郎(1895-1973)曾在《台湾乡镇之研究》文中提出集居、集村与散居、散村的概念,“所谓村落,就住宅的配置上说来,可以大别为集村(集居型)与散村(散居型)两类。前者是数十数百所密集在一起,后者则是每一处耕地中分布着一所或者数所。”畬民村落,不仅可以是“集村”,也可以是“散村”,后者是明清畬人很常见的居住形态,所谓“在丛菁邃谷,或三四里或七八里始见一舍”^[11],便是其写照。据《霞浦县畬族志》引述1989年的调查材料,全县畬族聚居的自然村有501个,其中186村畬族人口占90%以上,381村畬族人口占60%以上。^[12]那么,畬族人口比例在60%以下甚至不如汉族人口多的自然村,尚有120个。

郭志超指出,与其他地方不同,“闽东畬汉杂居的情形多一些”。^[13]我认为,这里的畬汉杂居,应

当包括畬族村落与汉族村落近距离错杂并置,也包括畬人汉人同村杂居,无论何种情形,都对畬、汉文化样态和畬汉关系发生显著影响。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和经济开发区域的拓展,明清时期闽东北的人地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仅从森林覆盖率的大幅度下跌和“虎患”“虎灾”记录的盛极一时,就可以窥见一斑。^[14]滨海地土尤其早已人屋密集。借助上述特殊历史机缘,原在游耕生计形态中的畬族群得以蜂拥而至,同来者尚有数量更多的回迁和新徙的汉族人口。他们只能见缝插针,错杂比邻而居,一方面不得不有资源竞夺,一方面也不得不学会和平共处。于是,从婚姻上的大禁忌小变通到整个文化上的既相区隔又相采借,逐渐形成族群关系新格局。这与畬族村庄上述位置特点当有一定的联系。

4. 畬族传统文化的现实形态及特性

(1) 畬族传统文化的“明清性”

承上所述,我们今日说的畬族传统文化,其主体只能是经由明清两代漫长历史过程,有限采借汉族文化,而逐渐发展定型的少数民族文化。

应当说明的是,少数畬族族谱谱首追溯到其祖先唐代就迁入闽东北,但一则,畬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载籍资料少而晚出,见录于谱牒的古事,其实出于口传,或至层层巧饰而陈陈相因,去伪存真颇非易事;二则,纵使有的传说中含藏史影,它也只是些罕见的个例,畬人成规模始迁时间,仍以定在明代较可落实;三则,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明代以前绝大多数的物质、非物质文化并没有流传到今天,实际上,闽东北的畬族传统文化,包括服饰、工艺、歌舞、民俗、武术、文物、建筑、族谱、村落等等,都是明代、清代乃至民国时期的东西。

所以,本文强调闽东畬族传统文化的“明清性”,试以外显性最强的建筑和服饰为例,稍作说明。

今日畬村尚能见到的古建筑,无不是明代以后(主要是清代以还)所建。此前畬人尚处在“游耕”状态,“食尽—山则他徙”,只能“以山林中结竹木障覆居息”。^[15]便是初到闽东北,也只是临时搭建寮棚,与一般“汀客”无异。在号称畬族古迹最多的村庄霞浦白露坑,雷世儒大厝、龙溪宫及雷氏祠堂等三组古建筑达 3000 平方米,被列为第六批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都是清代建筑。

畬女服饰,据郭志超的“知识考古”,畬族凤凰装作为一种文化建构现象,出现得很晚,其机制是

采借汉俗“凤冠”的文化因子,结合畬族祖婆为三公主、发祥地在凤凰山之类浓厚的凤凰情结而孕育,“畬族妇女服饰的凤凰意蕴及其外化形态,晚清已经开始出现,最早见载是民国时闽东罗源、连江的‘凤凰髻’,由发式而服饰的‘凤凰装’基本完善于 20 世纪 50 年代”。^[16]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古代畬族服装样式,不外两个途径,一是畬民偶得保存下来的先代实物和祖图,最早不能早过明末;二是清代乾隆年间以“御制”名义编绘的巨型画册《皇清职贡图》。后者中,由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提供画稿并经宫廷画师绘制而成的福州府畬民两种,载于《皇清职贡图》彩绘本卷二、刊刻本卷三,彩绘本每幅各画畬民男妇二人,取材于古田、罗源两县,古田县的画稿又取材于四都凤洋村。^[17]

浙南畬族绝大部分从闽东北迁入,情况并无大异。粤东、闽西、闽南的畬族,一般以为拥有更久远的历史,但他们或者渐渐融入当地汉族社会,或者陆续迁入闽东、浙南,明代以前的独特的文化成果并没有文字记载存留下来。

(2) 闽东具有相当丰富且完整的畬族文化资源

畬族是闽东最主要的少数民族,闽东是畬族最主要的集聚区。全市共设 1 个畬族经济开发区、9 个民族乡和 238 个民族村。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福建省畬族人口占全国畬族人口的 52.8%。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宁德市畬族人口分别占全国、全省畬族人口的?和?,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 91.7%。这里的畬族人口主要是明清以来自汀、潮一带规模性迁入的。闽东渐渐形成新的畬族聚居区。畬族为该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贡献,并且,畬族传统文化也得到较好的保存。在这个以“滨海山区格子状水系”为显著地表形态特征的闽东地区,至今保存着丰富的畬族文化资源。2005 年,徐永平“作为国家民委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发展研究》的独立主持人”,来到宁德市作田野考察,以为这里的畬族文化相对保留得最好,便在调查报告中提出“宁德是我国畬族标准采样地和中华畬族文化基因库”。^[18]

二、闽东畬族文化传承至今的若干“机制”

明代以还的闽东畬族文化能够相对比较完整的传承至今,自然要有一些内部的和外部的支撑条件,这也可以理解为若干保障性机制。

其一,地理屏障

地理屏障是最基本的文化屏障,越是古代越

是如此。闽东北的山川地貌,仿如福建的一个缩影。其山势,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山体西北面高陡,东南面“形如台阶层层降低”,这种结构对中原文化产生阻隔机制,对海洋却象一把“拥抱的圈椅”。二是地貌类型以中、低山地为主(63.6%),高低丘陵地次之(27.6%),不仅山地的峰崖兀立,切割强烈,地表破碎,连“起伏舒缓”的低丘陵也显得比较“破碎零乱”,这就造成区内交通的阻滞。

闽东北的水系不属一般的树枝状类型。在东南沿海浙、闽二省和紧邻的粤东地区,溪河多独流入海,受褶皱—断块山地构造的切割,形成格子状水系。其中浙江尚有苕溪(入太湖)、信江(入鄱阳湖)属长江水系;广东最大的河流珠江属树枝状水系,格子状水系以福建最为典型。宁德设区市境内这样的河流数量更多,“规模”更小,除古田溪可与闽江相通,这里的河流都自成格局,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就有36条,流域总面积占全区土地面积99%左右。河道纵横交错,加上山岭切割,把大地划成许多格子状的小单位,地形尤其“细碎”。

闽东北山水的特定结合形态,发育出许多串珠状的小谷地(溪谷、山谷、盆谷),一谷一村甚至数村,地名喜欢冠上某“洋”、某“坑”、某“坪”。例如,原宁德县洋中镇北洋村所辖自然村中,就有7个村名与洋、坑、坪有关。这些“洋”、“坑”、“坪”都是山区丘陵间的局部平地,但它们的实际面积很小。这种山川交错,使得地表分割细碎,各个地理小单元之间可以联通,但不便捷,文化隔离机制较强,具有很高的保真功能。^[19]

其二,婚姻壁垒

婚姻圈也是很古老且很有效的文化屏障。譬如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鲜卑拓跋部的大幅度汉化,还是门阀士族的自我固化,同不同族外、圈外的人通婚,都是被自觉运用的最重要的一个策略工具。畬族群的古代历史,是一部迁徙史;畬族群明清以来的“大地占有”形态,是散杂居形态。处于这种历史地理形势,最容易丢掉特色,丧失自我。畬民要承传文化,加强或维护本族群的凝聚力,族内婚制是无可规避的选择。

这方面的材料比较多见。畬民自况,如《高皇歌》中有“尔女乃大嫁我了,我女乃大主分你,”“蓝雷三姓好结亲,都是南京一路人”的吟唱^[20];汉人旁观,如郑祖庚《侯官县乡土志》中有畬人“结庐深山,聚族而处,有盘、雷、蓝三姓,自相配偶,不与

平民通婚”的描述。^[21]郑祖庚的《侯官县乡土志》写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时用作乡土教材。这种弱势族群封闭式的自我保护,在闽东北一带至少延续了五六六个世纪。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福安市坂中畬族乡18个畬族建制村(一共20村),畬民中族内婚占94.71%,畬娶汉占2.80%,畬嫁汉占2.49%。^[22]

其三,文字隔离

畬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仅有自己的民族语言。畬家“语言侏离”“沿蛮俗”^[23]、“方言与汉人异”,“其语言不通”^[24],畬族传统文化的积累和传承不能象汉族一样通过文字进行,而主要是通过口头语言传播和手头技艺传播来进行。有些畬族地区虽借助汉字记录畬族语音来传承传统文化,但毕竟不占主导地位。本族的历史源流、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主要是在家庭学歌、家族活动、习俗活动和宗教活动过程中以歌谣、故事、谚语等代代相传而实现的,“歌教”成为畬民家族传统教育的特殊手段。“歌教”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历史、宗教、礼俗、文学、农事等。“歌教”常要用到唱本,唱本以汉字为主,兼有别字、造字和特殊的符号。一般而言,家族中能完全依照唱本而歌者终究少数,大多数人主要靠记忆,通过口耳相传、博学强记、历经歌场,而练就盘歌的本领。此外,本民族的建筑、耕作、狩猎、染衣、制衣等传统技艺的延续,也主要是通过老一辈族人的身体力行传授给下一代而完成的。

绝大多数人不识汉字,对于文化交流,是很大缺点,而对于民俗文化持守则又是相对有利的。

其四,血统自信

畬族都奉忠勇王、三公主为始祖,认为盘、蓝、雷、钟四姓都有血亲关系,都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为畬家总祠。“每祭祖,则四姓毕集”。^[25]民族即家族的族缘观念成为民族认同的基石。他们以同姓同宗血缘序列建构“公祠—支祠—户—家庭”宗法组织;受客家文化的影响,热衷于修谱、建祠、祭祖、迎祖,设立族长、房长,订立族规、家训;将历代同姓文武官宦等附会为列祖列宗,虚构历朝皇帝的封赠;把畬家四大主姓的郡望嫁接为南阳郡(盘姓)、汝南郡(蓝姓)、冯翊郡(雷姓)、颍川郡(钟姓)。从清代到民国时期,闽东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畬族修谱先生和熟悉畬民家族文化的汉族修谱先生,他们为闽东畬族谱牒的定型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谱首《敕书》、《龙首师杖志》、《历朝封赠》等近

乎家族教本的权威性的乡村文献，确立了代代相传的家族伦理范本。畬族家族文化系统的成型，虽然采借了汉族文化元素，但也彰显出鲜明的畬族文化特色，而且重要的是，这种文化建构，大大提高了畬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对其文化承传是很有积极作用的。

其五、适度采借汉族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的延续，都不能搞“自我孤立”，都离不开与其他文化的接触、交流和学习，关键在于采借什么、如何采借。汉族文化的延续性举世艳称，它的强大的遗传基因在客家文化中有很突出的表现。与畬族类似，客家人也有漫长的迁徙历史和艰辛的“在地化”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也亟需建构辉煌历史，纯洁姓氏源流，严格族群边界，加强内部凝聚等一系列文化运作，修族谱、建宗祠尤其成为不可缺少的文化元件。南宋时期畬人在闽粤赣边界地区与客家人紧邻相处，彼此影响，学到不少东西，当他们大量移民闽东北一带，散杂居中又相对集中，创造性的发扬光大客家人的历史经验，可谓正逢其会。

如此等等，还可以列出一些。最基本的是第一、第二两条，核心问题是如何能够在散杂居状态下、在与汉族近距离接触和相互影响中保持其自身的文化底色。

而今时过境迁，这些过去行之有效的畬族传统文化承传方式，还有一定作用，但已经越来越弱，各种各样行政性的或市场性的或两者混合的“保护对策”遂应运而生。

三、当下的闽东畬族文化保护

近年来，闽东畬族文化保护和建设问题日益引起各个方面的重视，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形势依然有它严峻的一面。

1. 若干实绩

首先，2004 年宁德市启动了抢救与发展畬族文化的近期“八个一工程”。即对全市畬族文化进行一次普查；编辑一套《畬族文化丛书》；制作一套畬族文化专题光盘；建一座文物馆；开辟一条畬族风情旅游专线；命名一批畬族重点文化村；编辑一本中小学畬族文化乡土教材；创作一台反映畬族风情的歌舞剧，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其次，保护与传承畬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闽东畬族民歌、畬族小说歌、“奶娘催罡(gāng)”巫舞、畬族婚俗、畬族“三月三”节俗等一批项目先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批次	项目类别	项目名称	申报地区或单位
第一批	民间文学	畬族小说歌	霞浦县
	民间音乐	畬族民歌	宁德市
	传统医药	畬族医药六神经络骨通药制作工艺	罗源县
	民俗	畬族服饰	罗源县
第三批	民俗	歌会(瑞云四月八)	福鼎市
扩展项目名录	传统技艺	银饰锻制技艺(畬族银器制作技艺)	福安市

进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十七个项目，国、省两级合计 33 项，成绩突出。

再次，修编、出版一批畬族史志和文史资料。20、21 世纪之交组织修编、正式出版的畬族志有：俞郁田主编《霞浦县畬族志》，蓝炯熹总纂《福安畬族志》，蓝运全、缪品枚主编《闽东畬族志》，蓝纯干主编《宁德市(县)畬族志》，蓝炯熹主编《穆云畬族乡志》等等。

这一时期编印、出版的其他文史资料主要有《闽东畬族民间故事》《闽东畬族谚语》《闽东畬族百年实录》和各县(市、区)政协的畬族文史资料专辑。与此同时，福建省民族研究所陆续出版的福建省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畬族卷(已出家族谱牒、契约文书、小说歌、民间故事等分卷)和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畬族卷，为学者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基础。专题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果推出。

第四，大力弘扬畬族优秀文化。大抵同期，闽东建成了畬族革命纪念馆，畬族博物馆，中华畬族宫和闽东畬族文物馆，成立畬族歌舞团。2009 年 9 月，中共宁德市委批准成立宁德市畬族文化研究所，成为国内首家地市一级的畬族文化研究所。宁德市民族中学从 2005 年开始，坚持开设校本课程《畬族文化简说》，对各族学生进行畬族优秀文化教育。

2. 大倡文化“保护”的背景

当然，换一种角度看，文化本自承传有绪，无需刻意“保护”。文化在其共享者生活的不同层面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倘使下一代也认同、共享上一代的文化，那么，文化就有了传续功能。虽然变动是文化的常态，没有亘古不变的文化，但常态的文化变动，是自自然然的发生和演化，发生和演化之中，自有承传的底脉在，一般不造成大规模的、急速的文化断裂。

今日“保护”之声鹊起，乃是遭遇工业化、现代化潮流的特有景观。工业化、现代化潮流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发轫。可是，势头

远不像今天这么强急,良性的文化转型时还有佳例。工业化、现代化催生的全球化遍及各地,也多不如我们这么狂暴和鄙俗。在举国大忙种种粗放的现代化的“事业”竞逐巨浪之中,诸多传统文化事象的次第式微,无论畚、汉,殆不可免。我们的“保护”倡议,且不说被拒斥、被冷落,即使能够从“呼吁”到“政策”到“落实”都一路顺溜下来,也只能稍缓其势而已。文化人于此可以不甘不愿,可以心有戚戚,却不会有太多的有效办法。

以语言一端为例。畚族至少从明清以来就成为一个散杂居的族群,现在的情势,广大畚民还必然要进一步开阔视野,促进交流,接受新式教育,融入外面的世界,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学习和运用纷至沓来的新概念、新原理、新知识,参加或听取乡里、县里的会议、报告,其优秀代表人物还会参加省里、省外直至中央的会议和各项活动,学会熟练听、说普通话甚至外语,已是十分必要。精英具有示范效应,语言需从娃娃抓起,那么,“防治”畚语整体上的萎缩,很难不面临困境。^[26]从更阔大的范围说,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度把《中国濒危语言方言调查研究》立为A类重大课题,组织许多民族语言专家,调查各地濒危语言,记录、描写、保存相关语言资料,出版研究专著、词典,建立少数民族语言音库,录制、保存濒危语言的声像资料。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很可喜的成绩,但也毫无疑问,这些制作标本式的保护最终不能阻遏绝大多数濒危语种的消失。

3. 诸种“保护”的路径和限度

当下的保护文化与历史上的文化承传,有一个最大的分别,即是传统文化哪怕是其优秀精华,也已从“承传”的主体变作“保护”的对象。所以,保护者虽也费心劳力,却未必能够契其要领。

有一种常见的保护办法,可以称之为“展演式保护”。它往往与近二三十年蓬勃兴起的旅游业相结合,把文化做成“节目”献给游客。其成效也不算小,一可筹集各方资金,二可挖掘民俗资源,三可宣传地方优势,四可增进异族群对你的初步了解,等等。难以承受的代价是,民族文化往往被抽离它生命的整体环境而或多或少、或快或慢走向媚俗化、娱乐化和他者化。林锦屏以宁德八都猴盾畚族村“三月三”歌节为个案,观察其间民俗文化的功能异化现象,认为“权力与资本共同作用,将民俗文化符号商品化”,“在重新建构民俗文化符号的过程中,许多的民俗仪式恢复了,民俗物品被保

护起来了,从表层上说,传统文化由此得以延续甚至彰显,但从更深的层面上看,文化符号象征意义的神圣性被旅游活动的娱乐性消解了。……有些少数民族的仪式(如祭祀)只有在特定的日子才举行的,而如今为了开发民俗旅游,变成了一种为外来游客而进行的表演,”其非同平常的神圣意义已经消失了。^[27]

还有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被命名为“生产性方式保护”,颇能兼得政府、企业和学界的认可。在原理的层面上,笔者也以为,这是一种切合手工技艺存在形态和传承特点的保护方式。而若结合实践的层面来考虑,仍觉得此中尚多不易处置的榫口。生产性保护的原则是对技艺体系和核心技艺的保护。手工生产是保持个性化、差异性的生产,不能大批量的克隆复制。宁德市霞浦县崇儒畚族乡上水村久享盛名的花斗笠,编织一顶需要270多根80厘米长的细竹篾,经过砍竹、裁竹、削蔑、打顶、做胚、修边、夹料等37道工序才制成,这里曾经是畚族手工艺制作集中地之一,目前全村能完整制作花斗笠唯有80岁老人蓝兴佳,村里刚给他“配了”三个徒弟。^[28]这样的传统技艺不像名酒、名茶一类制造业,做不到也不该做到后者那样的大机器生产规模。真要做到了,该传统技艺的真髓和魅力便丧失了。

中国近年来的文化保护,以其时兴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来看,虽然所指涉的保护对象主要是底层的、草根的、民间的、地域的、村野的和族群性的,但它的基本运作方式却是行政主导、自上而下层层动员、基于政治判断而展开的。结果便在“保护”的同时带来种种破坏和伤害。诚如周星所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明显地具有将民俗文化按照行政区划及其级别来区分等级的倾向。县级、省市级、国家级和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序列,原本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便利,它一旦成为体制,便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重要性和价值的等级制结构体系,这完全是非学术的,有悖于文化平等理念。过度倾斜关照某些特殊的文化项目而忽视或无视其他一般的文化,则有悖于文化生态和文化多样性原则。”^[29]在行政主导、行政干预日益成为各项文化事业驱动总引擎的形势下,文化等级制、文化民族主义等问题,几成无解。

目前很流行的一种保护模式是建文化生态园,这是“集萃”模式,在不少地方都出现过。宁德市民族宗教事务局也已完成《中华畚族文化生态

园规划方案》,总占地 350 亩,总投资 6.8 亿。应当承认,如前文所述,畬族的特异处在于它漫长的迁徙史和现实的散杂居形态,在这种情势之下,建个文化生态园以集中展示畬族风采,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而且这种模式也有一些长处,主要是有规模,有影响,有经济效益。

它的短处是“展演性”强而“在地性”弱,因而在文化上的“可持续”存在缺口。从根本上说,文化的产业化孕含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产业化运作对民族文化保真可能产生很大的破坏性。虽然文化自身是动态的、发展的,但产业的利润取向、规模经营,极容易迫使或诱使文化成长背离其固有逻辑,发生巨大扭曲。特别是在我国,严重缺失文化批判传统,例如象法国那样的以 T.W.阿多诺、M.霍克海默创立的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与时递变的相关新学派的自省、反思传统,特别容易迷失在经济扩张的凯歌声中,民族文化特色的生命力显得特别脆弱。

文化产业“求大求快”战略和种种“恶搞”的运作过程,以及“文化企业重组并购”风潮日盛,引起一些学者的警觉。胡惠林指出:“2006 年以来的全国性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规划制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对文化历史地理生态系统的大规模改造,是一次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原有历史地理生命系统的颠覆与再改造。在当代中国,似乎还没有哪一种产业形态有如此能量改变着中国的历史地理人文生态。”^[30]这就需要我们在文化产业热中保持一份冷观察和冷思考。在畬族文化自我承传的整体环境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保护者当深存戒惧之心:保护的力度强、热度高、速度快、场面大,不等于保护的效果就好,有的时候特别是一切都作大跃进状的时候,各项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如果能够放慢一点脚步,是有益于文化变迁和文化延续之平衡的。

当前的一个普遍性的误区,是用城市规划或区域规划的概念、理念来规划文化产业的发展,例如“纵、横”“园、区”“圈、带”等,其实都是城市规划或工业经济规划的空间表达,不能确切表达文化产业生命运动的内在逻辑。^[31]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在文化产业运作中务必高度重视文化保护问题,各个文化产业,包括本文前面提到的歌舞团、风情旅游、工艺制造等等,都要注意防止民族文化原质的流失和异化。越是大型的文化产业,保护的问题可能越严峻。

四、加强闽东畬族文化生态保护的几个原则

纵如前述,我们也只能在已然遭遇的既定环境下加强畬族文化生态保护。工作千端万绪,无力深论,这里尝试性的约略提出几条应当予以注意的事项,谓之“原则”其实很是夸大其辞,聊以邀人瞩目而已。

1. 真正树立“保护为主”的理念。根据国家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畬族节俗文化的生态保护,要把“保护、抢救”放在首位,“利用”和“发展”都是第二位的,而且是为“保护”服务的。现在的问题是,一谈保护,马上就与利用、开发搅在一起,变成“保护”搭台,“开发”唱戏,结果往往越保护,文化原质越少、越走样。为避免误入歧途,要慎重从企业引资,要慎重与旅游开发结合。企业的天性是追逐利润追求回报,旅游开发的根本取向是迁就顾客的口味,这在经济领域本来无可厚非,若要赋予文化保护的严肃使命,便不宜草率成交。这里特别需要呼吁、敦促政府加大投入,这是其本职之所在。在资金来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或许只能“抓紧”而不“提速”。文化保护通常属于“细活”,那种大干快上、大开大合、大刀阔斧、大包大揽的风格,不一定合适。

2. 高度强调“在地”“生态”的意识。照我的体会,所谓在地,就是与全球化、普遍化相区别而与特定人群具体的本土知识、地方经验紧密联结;所谓原乡,是指祖先未迁移之前居住的地方;所谓原生态,一般定义为经由自然传承、未受外界冲击的原来的人文形态。三个词,意义接近,互相补充,极示强调之意。当然,变迁是文化的常数,今天已不大可能还存留纯粹的原生态文化,但相对而言,某些族群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较少受到工业、后工业文明冲击,大体未被卷入全球化浪潮的传统文化,还是颇不少见的。就闽东畬族文化的生态保护而言,我很赞同一位畬族朋友也是专家的看法:今天所能看到、所能讨论的畬族传统文化,只能是经过有清一代的发展而定型的畬族文化。这种文化在清中叶到民国时期尚未受到深度扰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变迁大大加快,但它在晚清民国的风貌至今依然留有比较完整的痕迹,它的诸多元素依然紧紧植根于闽东广大畬村,“在地”的、与其存活环境浑然一体的保护还是可能的和有效的。

3. 综合运用两种保护模式。一种是前文说的建设文化生态园的“集萃”模式,它有长处,也有短

处,2010年9月福建省政协视察团到宁德市调研,有的专家曾对此持质疑态度,但对于散杂居形态的少数民族,这种保护方式有一定的可行性。另一种是村落生态博物馆模式,选择条件合适的畲村,建立村落生态博物馆,对畲族文化原质及其生存延续整体环境实行深度保护。这里的“合适条件”,主要指:村中畲族人口占比大,畲族文化资源较完整,有较好的文化保护自觉性,与周边存在一定的文化隔离机制,等等。如果能把两种保护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效果自然会更好,生态园的文化展演也才后继有人。这牵涉到民宗局、文化局、建设局、民政局等多个职能部门,协调工作很重要。^[32]

4.与汉文化遗产保护并行相济。如上所述,明清以来畲族作为一个散杂居族群,与汉族的关系非常密切,在畲族人口最为集中的闽浙南地区表现尤其突出。畲文化的不少成分来自汉文化,例如民间信仰、家族的物化形态即谱牒、宗祠等。而这些在汉族社会中,很容易以“封建迷信”遭受遏制和排斥。这种氛围很自然会影响到畲族社区。以盘瓠为轴心的民间信仰是畲族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核,而家族认同是畲族民族认同的基础。来自汉族社会的对于民间信仰和家族观念及其物化形态的遏制和排斥及其形成的社会氛围,对于畲族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在民族杂散居地区进行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时,不能忽略的问题。少数民族与汉族的文化遗产保护应当并行互济。^[33]

5.重视开展科学研究和调查。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和调查的基础上。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相当薄弱。首先是队伍不强,虽然成立了宁德市畲族文化研究所,基本都是兼职,全市的研究力量也欠整合。其次,以往的研究、调查,偏重于基础性的问题,畲族文化生态保护方面的专题调查、专题研究,才刚刚起步,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扶持。这两年市社科联组织课题申报,有一定作用,希望今后能做得更好些。再次,对市外、省外的成果采借乏力,例如,我们制定闽东畲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当然要吸纳《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景宁畲族自治县畲族原生态文化保护区实施方案》的经验,但三地情况不同,去取之间,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把握族群生态文化的内涵,明确保护什么,保护基点在哪里,如何保护,各种保护方法的利弊何在,怎样处理好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化转型的关系,等等,这才能真正用

好人家的经验。

6.在承传中尝试保护,在保护中尝试发展

这一条放在最后,并非最不重要,而是考虑到践行最难,其实它才是最根本的。也就是说,纵使在上文所谓文化保护的话语框架下,我们仍须把努力的基点放在小心修复承传机理上,以“承传”为“保护”之期愿,以“承传”为“保护”之旨归。这样的保护,只能是低调保护,要特别警觉政府主导、官员主办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认识到政策推动、组织引导、评比示范、做大做强等功利化的措施、办法,都难免有一定的副作用,都可能伤及本来就已在走向式微的文化承传脉络。当然,保护不能阻塞发展,完全杜绝发展和开新,保护也会失去生机。关键在于对历史文化有真诚的“温情与敬意”,对本民族的传统有合乎理性的自豪和热爱,对异民族的传统有出自内心的同情和尊重。这样的发展,只能是有限发展,而尽可能避免任由城市化的巨型推土机席卷乡愁和牧歌,急匆匆打造一片又一片水泥建筑丛林。

反省以往的政策性保护措施,或许还应当对“积极歧视”问题有所警觉。“积极歧视”(the positive discrimination)起源于1960年代的美国,原是为弥合人种、性别、宗教、地域、残疾、贫富等方面的不公平而面向弱势族群的临时性倾斜政策,它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双赢的效果,但实行久了也引起反思和质疑。法国便更多的执著于文化融合,例如“政府要求移民的儿女吸收奉高的语言和文化,以便到了下一代族裔和来源问题变成无关紧要。”^[34]这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毕竟,我们的理想是实现人与人间的真正平等,而不是致力于加强那些并不具绝对性质的族群界线,那么,我们在“保护”工作中,何者必得守持,何者可促“融合”;又何者只是“权宜之计”,何者才真正带有长程性质,乃不能不深思细辨。

总之,回溯畲民大量入迁闽东北以及浙东南,建立新的住居中心地,凝聚成中华人民共和国56个民族中的一个新成员,观察其间珍惜、持守、承传特色文化以区别他人、固结自身的种种法门,我们以畲族文化的历史传承方式比照当今的保护办法,由丰硕成效返观基本局限,但对诸种局限有无破解的良方,对现实规擘又能有多少启示,均不敢奢望,惟期待言者、行者于此皆能更深的持抱一份敬畏和戒惧之心。

注释:

- [1]可参看王明珂《羌在汉藏之间》和李亦园先生的序言,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今有中华书局2008年简体字版。
- [2]谢重光:《畬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第五章第一节,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172页。
- [3]蓝图、蓝炯熹:《闽浙赣交界地:地理枢纽与畬民族共同体的建构》,《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 [4]参见施联朱《几种不同类型的民族识别·福建浙江的畬民识别》,收入施联朱《民族识别有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3—64页;陈永成主编《福建畬族档案资料选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 [5]详见林校生《“滨海畬族”:中国东南族群分布格局的一大变动》,《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 [6]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民族出版社,1995年初版,2005年修订版。
- [7]“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1866—1952)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见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
- [8]详见林校生《闽东北畬僑关系初识》,《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 [9]关于畬族规模入迁与福安洪水灾害的历史联系,笔者受到畬族研究专家蓝炯熹的启发,曾多次就此交换过意见。按,福安现有721个畬族自然村,见钟雷兴自传《梦里畬乡》,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 [10]详见林校生:《滨海畬族漫谈·畬族缘何得以大量入迁闽东北·闽东北滨海畬村群落的形成》,载《东南周末讲坛》,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42—244页。
- [11]见清道光本《建阳县志》卷2《舆地志·附畬民俗》。
- [12]俞郁田编纂:《霞浦畬族志》第2编第1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8页。
- [13]郭志超:《畬族文化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68页。
- [14]详见林校生:《明清时期闽东北的“虎害”和生态》,《福建文史》2014年第3期。
- [15]见明嘉靖三十五年本(姚良弼修,杨宗甫纂)《惠州府志》卷14《外志·瑶蛋》。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27册《广东·下》“博罗县志”条。
- [16]郭志超:《畬族凤凰意蕴的妇女发式和服饰之缘起》,2009年全国畬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畬族文化新探》,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 [17]参据《清实录·高宗实录》卷419,乾隆本《古田县志》卷2《风俗·畬民附》。
- [18]徐永平:《福建宁德畬族(聚居区)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调查报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 [19]详见林校生《闽东区域文化初识(下)》,《福建文史》2010年第4期。
- [20]《高皇歌》,见凌纯声《畬民图腾文化的研究》,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年;转引自《畬族社会历史调查》附录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5~368页。
- [21]郑祖庚:《侯官县乡土志》,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与朱景星《闽县乡土志》合刊),第383页。
- [22]转引自蓝炯熹《福安畬族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 [23]见清光绪本《遂昌县志》卷11《风俗·畬民附》。
- [24]见清道光本《建阳县志》卷2《舆地志·附畬民俗》。
- [25]见清同治本《贵溪县志》卷1《杂类轶事》。
- [26]关于全国最大畬族聚居区闽东的畬语濒危情况,可以参看赵峰《闽东畬语濒危现状考察》,《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闽东畬族母语的传承与保护》,《长春工程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年第12卷第3期。
- [27]详见林锦屏:《乡村旅游浪潮下民俗文化功能的异化》,《宁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 [28]关于霞浦县上水村花斗笠工艺最近的报道,可读林鹏浩《畬族花斗笠:婉转于手间的农耕记忆》,载《闽东日报》2012年8月14日。
- [29]周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和中国民俗学:“公共民俗学”在中国的可能性与危险性》,《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
- [30]胡惠林:《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新战略理论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 [31]参见前揭胡惠林文。
- [32]以上三点,根据笔者在宁德市政协会议上的发言(2011年)整理。
- [33]参见郭志超:《从闽东白露坑看畬族文化遗产的保护》,收入金星华主编《民族文化理论与实践(首届全国民族文化论坛论文集)》下册,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932~933页。
- [34]简要的评述,可参见[美]史蒂夫·奥尔森,霍达文译:《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第10章“移民与欧洲的前途”,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6~193页。

[责任编辑 林锦屏]